

中華民國三十年五月廿日 收到

中華民國三十年四月十六日出版

# 三民主義週刊

第一卷

第四期



## 本期目次

當前的分配問題

伍啓元

論移風易俗之道

王政

政治訓練的心理基礎

陳劍恆

思想自由之條件

李長之

當前讀書偶得

陳之邁

國際執事

探驪

三民主義週刊

本 刊 航 空 版

香 港 桂 林 西 安 金 華

三民主義週刊社

重慶慶心堂二十號

中國文化服務社

重慶慶心堂二十四號

定價每冊一角 半年二元五角

# 當前的分配問題

伍啓元

應根據節制資本與平均地權的原則，與以合理的解決。

戰爭雖然沒有改變我們的分配制度，但戰爭確使中國的分配情形起了很大的變化。就制度來說，我們的分配制度並沒有變更；我們的分配還是一種和所有財產的分配制度；我們獲取財富的主要方式還是運銷，買賣，和各種收入；而我們的主要收入還是兼工資，薪金，地租，利息，利潤而得來的收入。不過制度雖沒有變遷，可是我們的分配情形，確有極重要的變動：這些變動會對將來中國經濟的發展發生重大的影響，則是沒有疑問的。

戰爭對分配的一個重要影響是利潤收入的膨大。在戰爭前幾年中，因為貨幣和其他種種的原因，商業的利潤特別膨大。抗戰以前，一個資本主經營一種企業，如每年能獲利（包括利潤與利息）達資本額百分之三十五，他已是一個幸運的資本主。現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了。一個比較能幹的商人，即使每年獲利率達資本額百分之三百或百分之五百，也是很平常的事。由於商業利潤的增大，凡經營商業的人和從事企業的人，都很容易獲得巨額的收入；於是國家的財富和資本就逐漸集中在商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手上。同時因為具有巨額資本的商人比較小資產的商人為容易取得利潤，所以財富和資本更集中到大資本的商人的手上。在戰爭的過程中，雖有不少的小商人一步一步地變成富有，但大部份的權益者還是原有的資產階級。換句話說，因為利潤的膨大，「富有愈富」，財富更集中到富有者的手上，在原有的各種資產階級中，以金融資本家的地位為最優越。他們因為從事於外匯投機囤積貨物，所得利潤比一般正當商人還要大得多。

戰爭對分配的另一個重要影響是固定收入者實在收入的減少。在中日戰爭中，正如在其他近代戰爭一樣，交戰國的物價繼續往上升漲，因而固定收入（指貨幣收入）者的實在收入自然伴比例的降落。在中國，受打擊最大的就是薪水階級。雖然有些物品的價格已經較戰前增加十倍，但大部份薪水階級的收入還是與戰前相去不遠。因此薪水階級的地位一天比一天困難。其中最苦的就是教員和公務員。現在一個中學教員或一個委任官吏，他的薪水收入已很難維持一家三口的溫飽。大部份已經閉門謝絕他們已往的儲蓄。因此，所有薪水階級都一天比一天地沒落，一天比一天地離開小資產階級的地位而走近無產階級的地位了。

戰爭對分配的第三個重要影響是勞働者地位的提昇。因為戰爭增加了勞動的需要和減少了勞動的供給，所以勞動者所收取的貨幣工資便一天天地提高。除了在抗戰的初期外，工資的增加不只能限得上糧食和其他物品的價格的增加，並且超過一般物價或至多勞動者生活費用的增加。大體說來，不僅貨幣工資是增加了，大部份的勞動者底實在工資也增加了。現在一個普通工人的收入已超過一個小學教員，一個高級技術工作人員的收入已接近一個大學教授或一個簡任官。就是一個洋車夫的收入也在中級教員或委任官之上了。

不僅勞働者的地位是改善了，就是鄉村中的小農和佃農，其地位也大為改善。一方面由於糧食價格的高漲（特別是在近半年間），一方面由於政府對農村所給予的各種補助，小農和佃農的地位一天比一天改善，農村一天比一天繁榮。大部份的小農和佃農，已經可以不再受高利貸者的剝削，已經可以開始有些積蓄了。此外農業的收入，也隨一般

工幣的上漲而上漲了。

上述各種分配的變遷使中國社會發生了四個重要的變化：(一)資產階級的抬頭，或為全國財富的支配者；(二)小資產階級的主要構成份子——教員公務人員——的沒落，其收入情況已變成與勞動階級相去不遠；(三)勞農階級生活的改善；(四)小農和佃農收入的增加。這四個變化引起與分有關的四個問題：(一)我們是否應該放任資產階級去積聚財富？(二)我們是否應該聽任小資產階級沒落？(三)我們對勞農階級應該採取甚麼政策？(四)我們在農村分配方面是否還有改進的餘地？我們對於這四個問題是當前最重要的分配問題。在這篇文章中，我們將對這四個問題簡單加以解答。

我們是否應該放任資產階級去積聚財富？我想，不少的人必然會對這個問題給予肯定的答覆。不但從實際方面說，資產階級為着他們本身的利益，當然反對政府的干涉，就是從理論方面說，也可以舉出很多贊成放任的理由。第一、我們現在是在戰爭中，戰時經濟的一個要點是使本國物品充足。政府本身既沒有辦法把各種物品從外國或沿海省份運進內地來，政府就應該放任商人去經營這些商業。倘使政府對資產階級的活動加以干涉，對商業的利潤加以限制，商人便不願冒險去把物品從外面運進內地來，這不是對國家不利嗎？第二、有些人以為中國工業化的一大阻力，就是中國人缺少企業家的精神和中國人干涉企業者的自由發展。這些人從抗戰以來商人階級的抬頭看到一種新希望，認為這是企業家精神發展的一個開始，應該加以培植，因為這種精神是工業化的一大推動力。第三、又有一些人以為中國所以沒有工業化，是因為中國資本不能集中。現在資本逐漸集中在資產階級的手裏，對中國工業化將有很大的補助。

上述各種理論都基於一個重要的前提，即我們願意走上資本主義的路上。倘使我們準備走西洋人在十九世紀所走的路，則我們自然應該放

任資產階級去積聚財富，應該放任資本集中到少數人的手裏，並且應該鼓勵企業家精神的發展。但根本的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走上資本主義的路？西洋人在過去實行資本主義的經驗，給予我們甚麼教訓？沒有疑問地，資本主義有過許多光明的成就，但資本主義也有它很多黑暗的一面。我們決不應不顧那些黑暗的方面而採取資本主義的經濟制度來達到工業化的目的。我們可以利用愛國精神代替獲取利潤的精神來達到工業化的目的；我們也可以利用國家代替資產階級來供給社會以工業化所需用的資本。只要國家一切上正軌，國家就可以代替資產階級來完成一國工業化的工作。而且中國工業化的工作必須迅速完成，而在迅速完成的秩序中，應該先從重工業着手。我們如把工業化的責任交給資產階級，則工業化完成的期間必會拖長，而且工業化的道路必先經工業然後才到重工業。因此，中國將來工業化的大任，是應由國家去負擔。所以，主張對資產階級採取放任的第二個和第三個理由，都無法站得住。

至於由戰爭期中短期的看法，而贊成放任，也是「似是而非」的理由。沒有疑問地商人把貨物運輸進口，貢獻很大。但他們所運進來的物品，不一定是對國家有益損害。他們不少的利潤，是從經營奢侈品得來的。試問這些奢侈品進口，對國家有甚麼好處？至於必需物品，則只要國家本身負責發法於必要時運輸進口，則限制商人到斷並不會產生甚麼不良的結果。

我們所以主張對資產階級的活動加以干涉，更有積極的理由。第一、無論資本主義已有過多大光榮的歷史，十九世紀式的資本主義早已過去了！在今後的世界中，絕不會再反歸十九世紀的放任主義和資本主義。這一次的世界戰爭，無論結果怎樣，它的歷史意義是對十九世紀式的資本主義的一種最後打擊。因此中國是不應該——也不會——再走上那條死路去。在我們前面的，應該是貧富差別較小的一種分配制度。

，因此我們不應該任由資產階級去增加他們的財產，以增加國家財富分配的懸殊。第二、在戰爭當中，我們絕不應加重國家內部的矛盾與衝突。現在全國大部份的人，正在困苦的状态中生活着。我們如放任資產階級單獨去「發國難財」和享受安適奢侈的生活，則很容易引起其他階級的不滿，因此增加國家內部的矛盾與衝突；這對於我們是不利的。第三、在通常狀態之下，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一定與國民利益相調和的。資產階級在爭取利潤時，每每只顧目的而不顧手段。因此，我們如不加以適當的干涉，則國家利益常常會受到打擊。由於上述各種原因，我們主張政府應該干涉資產階級的活動和限制資產階級的利潤。

事實上政府自抗戰以來，已規定不少的法規來干涉資產階級的活動和限制商人的利潤。例如政府的貿易統制，交通統制，外國統制，物價統制……就是對資產階級活動的各種干涉；政府推行所得稅，實施戰時利得稅，和實行物價統制，就是對商人利潤的各種限制。但截至現在為止，政府的統制似乎還沒有積極執行，政府的辦法似乎還沒有十分澈底，所以還有改進的餘地。

我們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是否應該聽任小資產階級沒落？我想，除了盼望現存制度立即崩潰的人外，很少人會對這個問題給予肯定的答覆的。我們認為小資產階級的沒落，其嚴重性絕不在資產階級影射之下。在一個國家中，小資產階級通常是社會的安定力量。小資產階級如得到滿足，則社會便容易安定；否則社會便容易發生擾亂。在抗戰時期，我們應該設法維持社會上一切的安定力量。因為這個原故，我們便不應聽任小資產階級的沒落。

我們若聽任小資產階級沒落，則會產生很嚴重的結果。許多小資產階級會離開他們傳統的士大夫的地位（即教書和做官）而走到其他階級的陣營裏。有些思想比較偏激的人，會走到敵路上去；又有些比較注重目前生活的人，會放棄其原有的職業而從事商業。中層階級這種分解運

動現在已經開始，如不加以補救，則這種運動會一天比一天加重。

近來朝野的人已經開始注意到小資產階級沒落的問題了。在最近（三月八日）舉行的國民參政會大會，便討論到新水階級人員的特遇問題。當時與這個問題有關的提案便有四個之多，一是「擬請中央改訂公務員薪給制度及給予標準以安定公務員生活案」，二是「擬請設法救濟新水階級人員使安心服務案」，定是「文武公務員應平等特遇案」。所幸者，政府也已注意到這個現象正在設法制止，以免社會的危機。

我們所提出的最後兩個問題是關於工業勞働者和關於佃農小農政府應採何種政策的問題。關於工業勞働者，我們應該更進一步改善他們的生活和更進一步抬高他們的工資收入。除了這個一般政策外，我們在這裏還應該特別注意三點：

（一）對工業勞働者的待遇，我們應該注意區域間的均衡。現在有些工業區域特別好，有些工業區域特別壞的現象，應該設法糾正。

（二）對勞働階級的特遇，我們應該注意地域間的均衡。政府應該照各地生活費用的情形，制定各地的最低工資。

（三）對勞働階級的特遇，我們應該注意負擔的均衡。現在支付工資的辦法很少注意到每一個勞働者的家庭負擔。只要工作相同，一個八口之家的家長，其收入與一個未婚者完全相同，這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我們認為政府對它應該特別加以注意和改善。

至於農戶勞働者極農，政府對他們應該採取與工業勞働者平行的政策，使他們的待遇，能夠與工業勞働者平衡。對於自耕農則政府應該進一步改善他們的地位。但在這裏政府應該特別注意設法改變佃農和半自耕農的地位，特別注意設法補助他們獲取土地所有權。平均地權，是三民主義中民生主義的一個重要項目。在這種物極必反變遷的時候，我們認為政府很可以利用這個機會來補助佃農和半自耕農取得土地所有權。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提出一種具體辦法：政府對所有自己不從事耕種而

只坐收地租的地主的土地，可以強迫出售與國家銀行，由國家銀行按應抗戰最初三年內平均價格而加以收買。但國家銀行所給付的不是現金而是一種分十年攤還的債券。經過了這種手續以後，土地所有權便從地主移到國家銀行。佃農可以依照政府公佈的價格向政府購買，並且可以分十年繳款。但在款項未繳足以前，所有權仍屬國家銀行。款項繳足後，土地所有權雖然轉給農民，但農民非得國家銀行的允許，不能自由地把土地出售，以防止將來有土地合併的可能。國家銀行並且保留購買土地的優先權。倘使政府肯採取這種辦法，則地主雖然不免吃點小虧，但農民却可以很容易地取得土地的所有權。在這物價急激上漲的今日，這種辦法無疑地是不難推行的。

當然，地主階級對於這種辦法，要極力的反對。但在這大時代中，當局為實行三民主義，是不應顧慮任何現存利益的反對的。至少政府應就歐甘等省試行這種辦法。我們相信實行這種辦法後，農民必然藉這

## 論移風易俗之道

，農村必然安定。農村安定是中國社會安定的一個必要條件；在已往是這樣，在現在還是這樣。

有些研究土地經濟學的人，或者會就大規模生產的利息來反對土地所有權的分散。這種反對論有一種根本錯誤，即把土地所有權和農業生產方式混在一起。事實上所有權和生產方式完全是兩回事。土地所有權可以分散。但如有必要，各農民在生產時又何嘗不能把土地聯合起來，作集體的生產？所以這種反對論是站不住的。

總括起來，因為戰爭的激發，中國分配情形發生了重要的變化。這些變化使我們不能不對分配問題加以考慮。就我個人的意見看來，今後政府對分配問題應該採行如次的幾個政策：（一）干涉資產階級的活動和限制商人的利潤；（二）改善小資產階級的地位；（三）增加工業勞動者和農村農民的收入並注重勞苦業者待遇的各種均衡；（四）利用物價高漲的機會相當地實現耕者有其田的政策。

王政

總黨在新生活運動七週年向全國廣播演詞裏說「我以為一個民族，要能夠振作自強，必須對外能打倒敵人，對內能掃除惡習，古人說：『去山中賊難，去心中賊難』，山中賊和心中賊一樣是要防害社會的進步，和民族的生存，我們民族在目前有外在的有形的惡敵，也有內在的社會風俗上和民族道德上的公敵，我們必須同時克服這兩重惡敵我們民族纔能真正復興。」

適有

風俗是支配我們日常生活的一個最大的社會力量。我們要想使我們的新生活運動發生廣大的效力，就必須自移風易俗方面下手。本文的目的在探討於何種情形之下我們可以達到風俗及什麼是移風易俗的有效方法。

粗淺地說，風俗是人適應環境以滿足共同需要的一律行為。人們受本能衝動的驅使在環境裏摸索，由無數量『嘗試與失敗』的經驗中偶

然發現一些有效的生活方式。這些生活方式因暗示模仿而流傳社會，漸漸成爲大家依循的一律行為。這種相沿成習的一律行為就是風俗；也就是社會學家所說的『民風』。

成爲風俗的生活方式，對社會成員發生一種強制的力量。不合風俗的行為雖然不算大逆不道，也要算越軌總不免遭人議論。同時，自幼依循的生活方式在個人心理上變成一種機械的，本能的反應，對於這種反

望，所以很少引起人的懷疑批評。

風俗既有社會需要做基礎，有輿論和習慣勢力做屏障，它應分是顛撲不破的；受它支配的人們似乎至多不過能輔助其自然發展並加強其力量而已。所謂『移風易俗』也者，豈不是幻想嗎？

然而風俗畢竟是人為的，它既不是社會的本能，也不是上帝命定的生活規律。人類能創造風俗，當然也能改變風俗，雖說改變的時候必須依循一定的法則。風俗起於社會需要，而社會需要是以環境為轉移的；那麼，環境改變的時候就是『移風易俗』的時候。我們要知道，風俗之產生往往於偶然的適應，而未必是盡善盡美，根據社會科學的知識，來改正不合理的風俗，不但可能，而且必要。

在這裏，我們更不能不注意的是，文化是人類控制環境的功績。但人類控制自然環境的技術，雖日益進步，而控制社會環境的能力則依舊是非常薄弱。這種物質文化前進而適應文化（即非物質文化）落後的現象，社會學者叫做『文化脫節』。文化好比一個有機體，它的各部分是脈絡相通的；脫節的文化必然失調，文化失調的社會必然是百病叢生。在這種情形之下，要想到社會問題求一個徹底解決，就必須調整文化使適應文化能與物質文化並駕齊驅。

風俗是適應文化的一個部門；所以，根據物質文化的動向發動合於新社會需要的生活方式，改造舊風俗使適宜於新的社會需要，顯然是社會運動的天職。依照社會動向所提倡的新生活方式發動的風俗，與自然產生的風俗同是根據社會需要，所不同者一個是有計劃的創造，一個是偶然的發現而已。

不過，創造新生活方式與改造舊風俗，雖說本來是同一件事情的兩方面，是它們的性質却迥乎不同。創造新生活方式只要對社會動向有正確的認識，對於固有文化能適量的了解，再能行之有方持之有恆，便不難成功。改造舊風俗的情形就比較複雜了。

風俗可以說是集團的習慣。我們常說，『習慣成自然』，『本是第二天性』。個人的習慣和社會的風俗，都是習得的行為範型不是習慣能，都是工具，不是目的。然而個人常常變成習慣的奴隸，風俗往往成爲社會的腳跟手拷。早已失掉機能的風俗，人們偏要緊緊抱住，到腐爛崩潰產生了滿人細菌的時候，還是不肯輕易放手。

過去的事實，雖證明人類最易守舊，然而守舊不是人類的本能，已失作用的風俗雖可藉習慣勢力繼續支配人心，然而守舊還是可以打破的。在這一點上社會運動的使命就是要糾止人們的守舊性，打破阻礙進步的風俗習慣。

據在我們眼前的是抗戰建國的大事業；而我們所聲建立的是一個現代化的新中國。在現代化的歷程中，我們必須加緊革除遠古時代精神的風俗禮教。自然這裏所謂的現代化絕對不是『全盤西化』的意思，因為我們的國情與人家的不同；所謂革除遠古時代精神的風俗禮教也不是把固有文化連根拔去的惡意，因為我們的風俗禮教許多是具有永久價值的。但是根據人類易守舊的事實，我認爲在目前提倡『保存國粹』的講要不如促進現代化爲迫切。俗話說：『真金不怕火燒』，有永久價值的風俗禮教不待人力維護自能繼續生存，而阻礙社會進步的風俗禮教却需人力來摧毀與改造絕不會消滅社會。

誠然，一個社會的風俗禮教整個是一套東西，人們對它們的反應也是整個的。舊風俗禮教有一部分發生問題，整個的舊風俗禮教往往失去精神實質與權威；於是社會心理的鐘擺也在由極右擺到極左，凡是舊的不論好壞都一筆勾銷了。過激的狂浪略見平息。風聲冷靜態度穩健的分子又出來提倡『保存國粹』，此乃社會變遷過程中一種必然的，也可以說是，健全的趋势。不過這種趨勢很容易助長守舊勢力的氣焰，於保存國粹的當兒連糟粕渣滓一齊視為國寶，結果時代的巨輪勢又呈現着倒退的模樣。

本來，社會變遷原則是進三步退兩步的。專就某一個時期看，表面上好像是循環往返，以就整個文化而言，實質上還是向前進。任憑守舊勢力怎樣頑強，已失機能的風俗總難遲早總逃不了自然的淘汰；所以，熱心求進步的人大可不必過分守舊勢力的過光返照為勝利的徵兆，從而否廢憤慨。那麼，我們為什麼還要費盡千辛萬苦來改造風俗呢？而不聽其自然淘汰呢？因為我們應該依據科學知識與往教的教訓，節省社會歷程中的浪費，而在急劇現代化的時期尤其不能不如此。

過激的狂浪已經平息了。現在的問題不是怕現代化運動阻礙了「國粹」，而是怕「保存國粹」的名義變成守舊勢力的護身符。所以我們應以改造的態度來整理舊風俗。改造的意義是變換社會動向重新估定舊風俗禮教的價值，一面放棄它們的糟粕，一面使它們的精華能以新的姿態再生於新的生活環境裏。

我們除了憑藉集體的智慧創造新生活方式改造舊風俗禮教外，還要根本剷除不合理的風俗禮教。說到這裏，或者有人要問：風俗禮教既是適應社會需要而產生的生活方式何以有的風俗禮教會變得不合理呢？其實，滿是一種社會需要的生活方式往往不是一種，而人類從暗中摸索而來的某種適應方法，行之既久，就要繁雜發生。因知識進步發現了某種生活方式的弊害，既加以裁制並進而代之以高尚的而滿足同等需要的生活方式——這樣的企圖與風俗基於社會需要而原固毫無抵觸。請以娛樂為例說明此理。我們都知道賭博飲酒是有害個人與社會的娛樂，但未曾不可一方面加以禁止，一方面提倡新語言及團體遊戲的正當娛樂，以滿足身心的需要，而增進社會的福利。

根據以上的討論，我們相信可以採取社會運動的方式，在一定範圍內，來轉移風俗。第一，我們可以參照社會學的研究和先賢前家的經驗確定文化動向，然後針對社會需要創造新生活方式。第二，因環境改變而喪失固有機能的風俗禮教可以改造。第三，危害個人身心與社會

福利的風俗習慣應該裁制，但須提他能夠滿足同等需要而無害較多的生活方式以代之。

「移風易俗」的可能範圍既經確定，我們可進而切實研究，在確定範圍內用什麼方法來達到移風易俗的目的。我們前邊已經說過，風俗是集體習慣的積累，所以，移風易俗的方法，可以說大致與培養和改正個人習慣的方法相似。我們試以舉例的方式說明關於方法的幾個要點。

「習慣」二字含有「重複」的意思；重複的方式有二：一個是時間上的重複，一個是空間上的重複。例如吸煙，偶爾吸一支不會上癮，天天不斷的吸，經過相當時期以後就非吸煙不可了。本來厭惡吸煙的人有時在交際場合却不過主人的情面，勉強吸一支玩玩，這是常見的事情。假如他社交的範圍不廣，或所到的場合煙煙的很少，吸煙便不會變成他的習慣。反之，假若在甲地吸煙一支，在乙地又吸煙一支，如此重複下去他就要不知不覺地養成吸煙的習慣了。

依同理，風俗之形成也一樣需要相當的時間和一律的環境。人人承認中國社會亟需培養遵守秩序之風俗，所以近來警察憲兵在車站維持秩序，略具常識的人不但樂意服從，而且常常還以負責者不能認真執行職責為憾事。不過這種事情縱然人民樂意服從並且負責者也能切實執行，但還需要時有之有行之善導才能見效。不過，僅能在車站上講秩序是不夠的；必須各種公共場所都能採取同樣辦法，經過若干時期以後，庶幾可以形成自動遵守秩序之風氣。譬如吸煙者，當局可以規定寄信人依局先後排列成行順次購買郵票，破壞秩序者局員得拒絕辦理其手續。其他如銀行兌現，戲院售票等，都應立下此種規則。久而久之，民眾就養成了在公共場合遵守秩序的習慣了。良好習慣的培養，極需時日，所以在培養的過程中應絕對不容許有任何例外。風俗乃一律的行為，所以必須貫徹一致。事就上面所舉的車站秩序來說，主管部分好像還沒有注意及此。按照規定，乘客入站須先取票，售票員依次叫號售票，此外還有

管理員守軍門嚴禁乘客上車；手續不算不週到不嚴密了。可惜這樣完美的辦法僅能適用於尋常百姓和一般安分守己的乘客。免票乘車的特種人物，公司職員的親戚，司機生的朋友，不待叫號售票早已一擁而上佔據了有限的車位。那些照規矩購票按次序上車的人，無論號數先後，都只得站崗受擠，像沙丁魚一般地讓人家運走。精明強幹者吃虧只一次，下次乘車不是說法『走門路』，便是理直氣壯的破關而上，車站上的糾紛十之八九恐怕是起原於此；而懦弱無能或潔身自好者，每乘車一次即減少一分守秩序的信念所以，容許例外的現象一日不剷除，守秩序的風俗一日無法養成。

風俗之形成，其主要的心理歷程是暗示模仿與交替反應。譬如，人人都感覺某種需要，但不知如何去滿足它，忽然有人發現一種滿足的方式，大家便相率效尤，一直到普及全社會變成一律行為。使人們得到滿足的一律行為能持久，有持久性的一律行為便是風俗，明乎此理，則移風易俗的方法便不難『思過半矣』。

『歸德總說仁義』的方法應用在個人行為上效力已經很微薄了，因為人類的行為，就一般而論，心理智支配的成分少，受感情支配的成分多；若是應用到理智成分更低的集體行為上，尤其難以收到很大的效果。沒有人善書鴉片說法，而鴉片暢銷；沒有人為賭博宣傳，而賭風盛行；禮義廉恥雖天天講，而四維不張。事實的教訓與社會心理的暗示使我們不敢過分信賴說理的方法。但是我們並不完全否認這種方法的價值；只要『歸德總說仁義』的人格整齊足以字祭堂，態度足以感動人，再能與他種方法配合使用，說理的方法也未嘗不能收到相當的用途。

標語、口號、漫畫、等方法弄得好只能引起口頭筆尖的反應，有如和尚念佛經，念得背誦如流，而所行所為却往往與佛經所云風馬牛不相及。抗戰以來許多標語口號已經變成家喻戶曉的口頭禪，圍觀居奇的好而滿地得『調劑糧食安定後方』。整天躺在床上吞雲吐霧的鴉片鬼也

會唱『起來！不願作奴隸的人們！』，逃避兵役不事生產的鴉片子弟也恬不知恥的高呼著『前方流血，後方流汗！』在這種情形之下類這令人相信誓誓奮鬥的抗戰精神與標語口號有多麼大的因果關係。然而這並不是說標語口號根本是無用的東西。只要能夠發着響亮，再加以編製得體運用適當，不斷地耳濡目染，至少是可以發生一種暗示的作用。盛大的紀念會與集團遊行，其功用在給民眾以強烈的刺激，因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想達到這個目的，平時對民眾必須更加以組織訓練，事前尤須喚起民眾的熱誠與自覺的精神。倘若以拉伕的方式臨時湊集烏合之衆，以兒戲的態度呼喚激動的口號，行莊嚴禮節的儀式！這樣的集會與遊行和舊日的迎神賽會一樣，把它看做一種團體遊戲可，要想藉它來，移風易俗使不免希望太奢了。

從表面看來，最易行而收效最快的莫過於『命令與禁止』的方法。一道命令發出去規定某種生活方式，這種方式似乎算確立了；禁止某種風俗，這種風俗，似乎馬上就壽終正寢了。殊不知實際情形並非如此簡單。人類本有一種好奇心，一部分人因種種關係，心理上養成一種反抗權威的趨向，政府禁止某種行為有時適足以引起他們對它的興趣，違抗命令要受處罰，但他們視受懲罰為榮耀而故意違抗命令。美國人在禁酒的時期特別喜歡飲酒，古今中外都以讀禁書為快事。這些例子顯示『命令與禁止』的方法具有種種先天的缺陷。

誠然，在人類心理上，好奇心與良心同時存在。畏懼心勝過好奇心的人僅僅受罰的損失與苦痛，只要有一分被罰的可能性就不敢違抗命令。生性忠厚的善良百姓，不待嚴刑峻罰的威脅，自然會奉公守法。不過這一般而論，守法的程度往往與受罰的機會成正比例，而執行命令却又不是件簡單的事情。在法治精神不發達或治不上軌道的國家，下級對上級的命令陽奉陰違，致使法令規章變成具文。就是執法森嚴的國家也不能單靠法令的力量來移風易俗。法令僅能約束外表，不能約束內

心，支持某種風俗的社會條件一日存在，執法益嚴，規避的方法亦益巧妙，結果好狡者適得其法外，無心為感者動輒得咎，到後來還是要修正法令以遷就風俗。

此外，我們要說的是：輿論不支持和民衆不遵心權護的法令，也不易收效，這類法令不外兩種：（一）違反人情的法令，（二）無關宏旨的法令。誠然，任何法令，執政者如果使用最大的力量和最後的武器，亦未始不可以貫徹。但事實上執政者絕對不肯以最後的武器來強制全體民衆，亦不肯因窮細事而喪失民衆的同情，所以凡是一般人不能奉行或無關宏旨的地方，就是不應該用法令的地方。反之。當民衆普遍地感覺某種需要而無法滿足的時候，當多數人對某種現象深惡痛絕而苦於輿論的勢力不足以抵制或取締的時候，這便應該用法令，以收速效。

世間自然很少與社會需要背道而馳的法令，但執政者却不應因切心維持風化而濫用法令於無關宏旨之事。如收縮『奇裝豔服』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一個勤的社會裏，衣服式樣，尤其是女人的衣服式樣，總在日新月異地變化着。喜新厭舊的心理和引人注意的欲望使一部分人樂

## 政治訓練的心理基礎

陳劍恆

我們中國以及世界上許多國家都各爲了民族的生存獨立而奮鬥。一個國家獨立生存的第一個條件，便是團結。因爲團結對內可以使人們信仰一致，對外可以使人們行動一致。在今日全世界都在進行着戰爭的時候，團結更與一個國家的存亡具有絕對的決定關係！

可是，團結並不是一個自然的禮品，而是努力鍛鍊的成果！一個沒有經過努力經過鍛鍊的民族其自然的團結能力必極薄弱，而政治訓練便是使人民團結的必要手段。換言之，一個國家爲了要求獨立要求生存

於採取新花樣，落後的恐懼與模仿的趨勢使多數人不能遵守成規。其實，女人穿什麼式樣的衣服與國計民生沒有多大關係，並且所謂『奇裝異服』也者根本是一個主觀的概念。像這無關大局而又無客觀標準可資依循的事情，最好不必以法令的方式來加以限制。何況『時髦』二字，顯名思義，所代表的是一種有時間性的東西。不合理的和違反大眾心理的服裝，僅能曇花一現，不等法令到選民間早已變成明日黃花了。至於合理的而民衆愛好的服裝，恐怕明令禁止也是枉然。

我認為，任何新生活方式，在民衆未能領略其價值以前，與其假手法令，不如發動社會上有地位的人先來實行，讓民衆自動地模仿，久之相沿成習，就會變成風俗。改善風俗也要在上者身體力行纔能生效。如果『只許州官放火，不准百姓點燈』，縱有嚴刑峻罰也不能根除腐敗的生活方式。

總之，風俗之產生與演變都依照一定的法則，以這些法則爲根據編定移風易俗的具體方法，實行起來，便無往而不順利；違背社會法則的嘗試，即便不會徒勞無功，也必事倍功半。

，求建設便不能不有政治訓練的實施。

政治訓練與普通教育一樣，就學習方面說，它所期望的結果，不外是使受教者得到某些知識及養成某種的習慣技能態度和感情。不過因爲施訓的對象不同，它的重心自然也就不同。從大體說，政治訓練是全國民無分男女老幼職業及教育的高低，人人必須接受的；就主體來說，其中心則是青年士兵及大多數的民衆——農人和工人。

因此，作者覺得習慣的養成，乃對青年士兵及民衆實施政治訓練的

一個主要目標。在這裏，我並沒有意思說，知識思想技巧態度的學習等可以忽略，不過比較起來，仍沒有習慣的養成更覺着重要。依我的意思，即使有思想知識等等的學習在內，他們的作用亦應以幫助習慣之養成爲目的。

譬如以信仰一致行動一致說，在最初步，信仰行動訓練也許有關於知識思想的訓練；但信仰的程度達到最高階段時，便變爲習慣。行動也是如此。所謂習慣，用教育的術語說，便是一種自動的反應，其性質與先天的生理的反射動作頗爲相同，不過前者乃是學得的而已。

更具體的說，三民主義在今日既應爲全國國民一致的信仰，這個信仰應當已是全國國民的一個習慣，而不再去問三民主義是否應該信仰。除了特別的專門的學術研究以外，大多數民衆對於主義的信仰是應達到最高的習慣階段。

就學術自由的立場來說，許多人都認爲，啓發思想乃是教育的最高任務。假設一個國家不是在危急的時候，自然普通教育也應該特別注重思想的自由。因此，常有許多學者或教育家對於政治教育中所通行的一般形式訓練，表示懷疑。如儀式訓練，標語口號訓練，集體的整齊劃一，制服儀章的規定，以及校訓的統一，新生活的規律等，在崇拜思想自由的人看來，都覺得似乎沒有必要。這種態度，乃是由於輕視習慣的價值而來。

然而就心理來說，習慣與生活的關係實在太重要了。

就日常生活論，一天的衣食住行幾乎大部爲習慣所支配。說話的口音清楚與否乃是決定於發音器官的習慣反應，吃飯的快慢是否合乎衛生乃是決定於咀嚼筋肉的習慣反應；其他如走路靠左邊，進禮堂脫去禮帽，與人言談各氣話等，無一不是受習慣的支配。

一個人的品格好壞道德好壞，也往往是習慣之結果。不守時刻不守

信用以及偷竊懶惰等，都往往是習慣的關係。例如，有一次，一個朋友請客，結果到時只發幾張座，而主人竟未至；致來打聽，實說是一忘了，其實這即是彼不守信用的惡習所觀。又有一次，一個家庭有百萬之富的熟入，而仍免不了掉去偷朋友的「一隻手錶」，這亦是他的惡習所致。一個人缺乏良好的適當的習慣，不但日常生活感覺困難，並且在緊急的時候必將墜入非常之危害。一個汽車夫必須養成許多習慣的動作，如開車時必須將腳放在停車的踏板上，如轉彎時必須按喇叭，如車行進時必須注意紅綠的燈號等；倘缺乏此種習慣，不但行車將受礙，干涉，高一不幸，更要遭受生命的危險！有一個初次行車的人，因缺乏之口向下或向上的習慣，而平射了一個同伴的帽。又有一個大學生，因缺乏不用鐘時將手彈卸出的習慣，從樓下打穿了樓上的天花板，這都是因缺乏正當習慣而致幾釀大禍！

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新舊過渡和國際鬥爭的時代，欲想建設一個現代化的國家，而不受國際的壓迫，也必須使一般國民有一個共同的政治訓練，培植一個一致的政治信仰和習慣。國民有了一致的政治信仰和習慣，而後對於國家和國際的問題，始能有一致的政治認識和行動，而不致於迷惘的歷程中發生離心離德之現象，於對外的鬥爭中發生分崩離析的危機。

政治訓練的作用，既在統一團結人民，信仰行動，以達到國家現代化及獨立生存的目的，則訓練的方法，自應注重養成人民正確的政治習慣和正確的行動習慣。如信仰主義，服從領袖，這些都是過渡時期和非常時期，國民人人必須養成的習慣。所以各種形式的訓練如升旗、呼口號、背誓詞、生活規律禮儀式的整齊劃一等，自各有其事實的需要與學理的根據。有些人懷疑他的效果，未免是過於重視思想的偏見所影響，但作者並沒有意思，認爲政治訓練可以不用思想了解感情態度等而以訓練習慣；不過習慣的養成，確極重要而已！

# 思想自由之條件

李長之

在原則上，我是絕對主張思想自由的；可是在有些條件之下，我不是主張思想自由。

所謂有些條件，是指人，時，和地而言的。例如人有智識的不同，有職業的不同，有年齡的不同。同樣一件事情，對於有專門知識的人，不妨讓他自由發表意見的機會，對於門外漢，却應當多少加以限制。像國術，國醫之類，如果真是體育一學（只是體育家不行！），醫學上的專門學者，提倡也好，反對也好，有條件地有所去取也好，我們都應該讓他們自由。否則打擊醫藥者流，江湖術士之類，也來亂插嘴，則事情未有不糟者，我們對於教育，對於經濟，對於國防，對於交通，對於生產，……也可作如是觀。中國到現在為止，一般社會還沒有養成尊重專家意見的習慣，就是「專家」們也沒有時時刻刻守住自己的崗位而去發言。二者實互為因果。我不否認有所謂通才，我也不貶抑他們的價值；但是中國末流的「通才」太多了，機械通，而實際上則是機械都外行。這些外行人的思想，何必讓它自由？

職業不同也是一個限制自由的條件。法院對於一個案件，必須徵集原來的證據，這就是職業說應當如此的。不屬這種職業的人，就不必讓他在這方面自由。所以法院裏常有疑，旁聽的時候，年齡也是一個重要條件，例如有許多話不能在兒童的面前說。總之，思想自由，是應該因人而不同的。一個醫生可以解剖人體，一個審判官可以知道一件有傷風化的案件的始末，同樣是一個社會學家對於任何派的思想應該有研究的自由，一個經濟學家對於任何派的經濟學說也應該有研究的自由。人從幼稚時期，可塑性是很大的，容易「先入為主」，所以對他們的精

神食糧應該加以區別和限制，但到了他們成熟的時候，就不妨讓他們自己去甄別，用不着處處加以限制了。不會走路的小孩，四圍人往往把他綁在母親的背後，然而這是恐怕他跌倒，並不是虐待；等到他會走路了以後，自然就不再綁他了因為這時如果再不綁他，就妨礙他的發育。

另一方面，是時間的因素。平時與戰時不同，國家大計在平時時和實行時又不同。在戰時，以爭取勝利為第一原則，所以凡不利於這方面的思想或言論一律在禁止之列。在國家大計的實行時，以效率為第一原則，所以凡有礙於這方面的思想或言論，也應當限制其傳播。中國人過去的習慣，在事先往往以不發表意見為謹慎含蓄，在事後却又以冷嘲熱罵為能事。王安石新法之行不通，其原因雖多，然而這却是一個重大原因，我們主張應當把這個習慣顛倒過來，在一件事情沒有實行之前，請你盡量指教，盡量批評，及一旦付諸施行之後，你就應當予以充分的同情和贊助，不可以在背後說長論短，阻礙事情的進行。

時間之外，又有空間的問題。十字街頭決不是法院，鬧市決不是診所。空間的不同，言論自由的限度也不同。魯昭公娶於同姓的吳，本不合禮，但是孔子答覆陳司敗的詢問時，仍稱昭公為知禮。陳司敗和別人談起孔子的偏袒時，孔子仍自辯辨，仍以輕微地說：「也幸幸，苟有過，人必知之」。孔子雖然自稱「過」，然而我們相信決不是由於孔子的諛媚，而是有意的「春秋」為尊者諱，為親者諱，為賢者諱」的實踐。說話的立場不同，思想或言論的自由程度，就不能不有出入；因此，我們解決反對留學生在國外替看外人挖苦中國，蓋地點不同，自由必須加以種種限制，例如戲劇的演員，一出台，則演員間的批評即不

能自由，儘管在後台大家可以彼此盡量改正。總之，自由是應該有地的限制的。

因爲有人，時，地的不同，絕對的思想自由是不可能的，但是在原則上，思想自由不妨作爲人類社會的一種最高理想。絕對的方或圓，是不可能的，但實質的方或圓仍不妨以此爲理想。人類社會的進化，本就以爲理性爭自印的一條大道！

不過現實的事物往往與理想相距很遠的；在中國今日思想上絕對的自由，不惟不可說，也不應當，——因爲在未爭取得民族自由以前的，究竟有什末個人的思想自由配講呢？

可是在另一方面，思想的統制也不是絕對的，因爲「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就其同者而觀之，固有不少同點，但就其不同者而觀之，實在也無法一致。既無法一致，則不能無爭，這是很自然的事。關於思想之爭，我有下列幾個簡單的意見：

第一，莊子上有一段話：「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聞之，使子貢往侍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爲人拘，子貢趨而進曰：請問爾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修行无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這是一個很難得的胸襟；對反對者的立場在某一限度內加以寬容，而此寬容是以了解爲前提，即不僅要了解自己的立場，而且還要了解別人的立場。

第二，因思想不同而引起辯論，有時也是必要的。孟子說：「道不重則不見，我且直之。」但是思想之爭是要以思想爲工具的，即將自己的思想公開陳述於社會，而不能施用思想以外的工具，例如我主張性善，張三主張性惡，彼此都有自由，但是我不能用不正當的手段去逼迫張三

，也主張性善。運動場上尚且有運動員的比賽道德，難道思想的競爭反而沒有一其爭也君子一風度麼？

第三，對於一般人，我堅決主張尊重專家的意見。使專家多發揮一些權威。社會上的人士應該知道管外行的事，說外行的話乃是一件可恥的行爲。這裏所謂外行與內行，是與地位無關的。社會上往往把一個有地位的人捧作高麗，久而久之，這個有地位的人也離了自己的短長和崗位了，於是真正專家的意見反不被重視。不重視專家，國家是沒法現代化的。不現代化就不配在國際競爭場中生存！

第四，就政府一方面講，任何政府爲樹立權威往往干涉思想，這也是自然的。拍拉圖的「理想國」亦即以統制思想爲主旨。因爲從國家的立場上看，思想若完全放任，就難免有動搖國本，或者防礙勝利的事出現，但是統制不得其道，也不免「防民之口，甚於防川」。那麼，如何是好呢？據我看，調和之道有二：一是開誠佈公，大眾雖然一時感覺不便，終必諒解，鄭人對於子產便是一個好例。二是取其大同，略其小異關於人的思想既不能完全相同，所以不妨在小地方使人們自由，而在大地方加以限制。思想的小小的不同，應該讓它有一個寬洩的尾閘。英國人的思想在當時可謂自由，然而實際上他們所受的限制很多；所以英國能改思想自由之利而不蒙其害。所以統制思想是應當從大處着眼的，得到大同，則小異自不成問題。

普通一般人總以爲統制思想的只有政府，殊不知真正有權威的統制者乃是社會。我們一切思想行爲，都不能逃出社會已成的規範之外，政府的力量在這一方面實在是較乎其微。例如中國過去的女人纏小腳，政府從來沒有強迫過人民，然而一旦成爲社會的習俗以後，若干年來再沒有人敢冒大不韙，出來作直言敢諫之士！中國的社會，在過去實在太情性了，凡一種思想風靡了以後，就無人敢加以非議。所以只有在社會的情性去掉以後，中國才有思想自由可言。

# 讀書偶得

陳之邁

法國以世界上的頭等強國，在短短的三十八天之內就被德國滅亡，這一件是當代及今後的歷史家所要研究的一個主要課題，並且是一個很不容易解答的謎題。現在沒法解答這個謎題的人已經不少，他們的觀點也不盡相同，甚至相反甚遠。最近我看到一位法國新聞記者西蒙對於這個謎題的答案，即 Andre, Simons, Jacques, The Didi Press, New York, 1941 書，這本書是原著的英文譯本。在這本短短的三百五十頁書中，這位眼看著祖國崩潰的熱血者，可說是充分地流露了他的憤慨之情。不過對於當代的事實是沒有方法去作一歷史的判斷一的，所以西蒙之書只可供我們參考，當然不足以佔千秋的定論。何況我們在此書中又發現了許多令人費解的議論，使人感覺到迷離。

我現在無法查攷西蒙在法國政治上有什麼主張——法國人總是有他的政治主張的，並且都是左右搖擺，把握不定。從本書的字裏行間看來，他很主張法國聯俄，很反對法西新國家，很痛恨達拉第，魁拔爾，旭東，及波奈等右派的人物，及法國的「火十字會」，認為他們是「背叛法國的人」，很尖銳地攻擊法國銀行及其背後的所謂二百個家族一的採取，很贊成人陣統政府二十四小時禮讓一及其它的勞工福利立法，很反對英法對西班牙內戰的「不干涉」策。由此我們也許可以想像他是一個左派的人物。他的理論是「物必先腐而後蟲生」所以他認為法國之崩潰是由於它內部的腐敗，因而失却了它抵抗強敵的能力。而其主要的觀點是認為領導法國的政治家，應該說是政客，都是同情於法西新主義的，因此而缺乏抵抗法西新國家侵略的決心，甘心領受張伯倫的領導，實行「綏靖政策」。就中尤以波奈十一人受其攻擊最烈，似乎認定

他是背叛法國的最大罪人。他說：「法國人民對於法國崩潰及解體不負責任，一法國不是被希特勒打倒的，它是由內部破壞起來的，是政府，企業家，官吏及軍隊中的第五縱隊的勾結」。

我們讀了這一本書雖然面證據都不甚充足，自然不免發生許多疑問。這些疑問使我們一方面對於作者寄予深厚的同情，一方面却不敢相信他的論斷的正確。在一九三三年正月，希特勒在德國登台，達拉第在法國任國務總理。希特勒掌握德國的政權直至今日，法國却在此時期中間有過右派政府，却同時又有極左派的人民陣線政府。右派的政府與蘇聯簽定法蘇協定，但不曾誠意地舉行軍事談判；左派的政府却也不積極與蘇聯合作——希特勒的政府是維護對西班牙內戰的「不干涉」策一的，它曾禁止蘇聯援濟西班牙政府的軍火過境。法國的共產黨不曾積極主張對德宣戰，一九三九年九月對德宣戰的仍然是達拉第。右派與左派在外交上好像看不出特別不同的地方。一綏靖政策——在今日看來顯然是失敗了，但是慕尼黑協定在當時確曾為法國的人民所贊成，否則達拉第政府如何在法國站得住腳？右派的外交家波奈固不高明，左派的波爾布希也看不出怎樣了不得，若論才具識略，恐怕還不如前者，西蒙對於這一點也得承認。左派政府當權時，法國的資本家發動資金逃避，因而不思於國家的行為；左派的政客一次又一次的鼓動全國總罷工，因而減低國家的生產力量（尤其是軍火軍械），也是不思於國家的舉動。法國的工人每日只做八小時工，並由工廠為他們辦理種種的工餘娛樂這些究竟都與國防建設沒有直接的影響，甚至背道而馳。由此可見無論在外交上抑在內政上，左右兩派的主張，在積極建設國防上不見得有多

步幾別，雖則在政權的爭奪上，他們却都是火熱的一派不肯放鬆。

從前有一位評論上次世界大戰以後歐洲政治的人說：「歐戰的餘波在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間都在戰場上纏繞了，大戰以後，各國都還有一個真正出道的政治家。」從這一本書中我們看出法國政治人才的極端缺乏，在官海裏浮沈的盡是一班庸碌平凡的小政客，同時法國那個令人髮指的多黨制度又在鼓勵着他們。那些負着實際政治責任的人們，成天在作無聊的政論鬥爭，一個一個的向如萬花筒般地上彼落，使做部長的人沒有多少閒工夫來辦他們應辦的事。一兩個真正偉大的政治家是可以保持路易第十四以及拿破崙的法國的，但是一羣小政客的爭權奪利則只有使國家崩潰。西蒙是一個典型的現代法國人，總忘不了那個

### 南斯拉夫小景

左右兩派調和而穩定右派的政客出賣了他的祖國。他忘記了真正使法國國防最嚴厲的還是這個不斷的左右之爭，尤其是一班小政客的左右之爭。在強鄰壓迫的局勢之下，一班政客不顧國事，整日在爭奪政權，寧能不惜致亡國的慘痛？並且因為爭奪政權而竟採行破壞國家的舉動，如右派的資金逃避及左派不斷的罷工，國防又怎能建設起來？法國的政爭太過激了，太自熱化了，法國也就因此崩潰了。西蒙這一本論法國失敗的書是在巴黎崩潰以後出版的，他的主題還是「西蒙這一本論法國失敗的書是在巴黎崩潰以後出版的，他的主題還是「西蒙這一本論法國失敗的書是在巴黎崩潰以後出版的，他的主題還是」爭權，法國的人民已經在歐戰的鐵蹄下，從事於黨爭的人們已經失却了他們的舞台，但西蒙們還在彼此爭，還在彼此罵。有光榮歷史的法國西民族，真的就如此不爭氣嗎？

在南斯拉夫的夏天來了，太陽熾烈，天空老是藍藍的，輕易不落一場大雨，到冬天，一種串的是陰雨天，但是并不冷，高地上仍是溫暖的。她的面積也不算太小，有二四九〇〇〇萬方公里，山地竟佔去了四分之三。能生些松杉林木的提那利克山，橫亘在西部，造成了兩通海的障礙。山與亞得利亞海間，僅有一條極狹窄的平原和海灣。塞爾維亞山地與馬其頓而泉井稀少，被摩拉瓦河及發達河的谷地隔離開，淺草平可河牧羊牛畜養。在西部山區，石灰岩到處突露着，流水多在地中通行，地多鹽河及其支流撒夫河與底拉維河一帶低地。在這些地方，都豐裕的遍種着小麥玉蜀黍和水果樹。

天然的礦藏并不多。在這國度裏，僅在西北部接近中陸的地方，有些工業設施，但他們都是依靠甸奧的市場而生長着的，大部分還得說是農業。她的出海口幾乎都握在外人的手中，向西出亞德里亞海時有三條路線。除提那利克山由山而出一條鐵路外，其餘的兩條，一是鐵路一是河谷，西線在意大利的手中，出愛琴海，有發達河及沿河的鐵道，但必須經過希臘的領土。往東去，往北去，無不是沿着鐵路或是河谷都必須要經過別的國家，才說到達海灣。所以在交通上，南國是感到十分的不方便。

居住在這塊土地上的，有一四三〇萬人，其中有塞爾維亞人，克洛特人，斯洛芬人，馬其頓人和少數的其他民族。他們并不和睦的共同生活着。這種不和睦，已經演出許多不幸的事件，現在希特拉的侵略下，希望他們不要再鬧民族的糾紛，而飛奔到地勢展開游擊戰。

# 國際軼事

探 驛

我曾經放一隻竹籃沈到海底，有意無意的撈回深角落裏的奇珍，由此窺見另一世界的真面目。——安德列·莫洛瓦

## 忠勇的軍人

去年四月德軍佔領丹麥，丹麥國王克理斯丁十世曾親率德軍充諾，舉凡內閣問題極須尊重丹麥之主權，某晨國王在哥本哈根巡遊，曾見某公共建築物頂有德旗飄揚，國王立即在馬上命令當值之德軍官將旗撤下，德軍官加以拒絕，最後國王堅決表示，限於十二點將德旗降下，否則，將令丹麥士兵執行之，正午前數分鐘，國王歸來，仍見德旗飄揚，並未降下，於是國王乃重申前旨，將令丹麥士兵執行，德軍官怒曰：「丹兵如來，決槍斃不貸！」國王毫無懼色，從容行至屋前，啓運而前：「余即此丹麥士兵也！」德兵不得已乃降下旗。

## 羅斯福總統的親信麥勒特

羅斯福總統的親信人員共有八位，洛威爾，麥勒特 (Lowell Mellett) 便是其中之一。麥勒特曾任新聞記者，一九二〇年主編揭煤者週刊，一九二一—一三七年主編華盛頓每日新聞，同時兼任實業德系報紙同盟的經理達十二年之久。在一九三七年羅斯福第二屆總統任內，氏以主張新政，被委為全國非常委員會主席，一九三九年委員會改組為「府情報局」，直隸總統府即改任局長。麥勒特今日所處的地位實與已故羅斯福親信路易士·賀 (Louis Howe) 相埒，每逢與總統商榷時，亦如路易士賀一樣，兩人意見常紛歧，但他仍是說服者，決不畏慮。

政府情報局雖不在白宮，然麥勒特則隨時不離總統左右。羅斯福照

例每半週招待新聞記者一次，每次麥勒特之座位均坐在距離總統數尺遠之藍色天鹅絨靠椅上默然不言。至於情報局的工作主要是將情報分傳於聯邦的行政及立法機關。此外，總統有時並命麥勒特本人替政府做些宣傳工作，諸如出版物，廣播，電影之類。

麥勒特身軀短小，看來頗似國務卿赫爾姿態整飾，頭髮雪白，聲音柔和，也同樣愛穿藍色衣服。開時麥勒特如不打高爾夫球，便以讀書自遣。他最喜歡讀林肯自傳的南北戰爭時代一章，他的理由是「假如我們能夠忍受當時的困難，什麼事情我們都能忍受」。

## 美國的巨型轟炸機

年來美國曾專心致力於巨型轟炸機之研究，使其翼航力持久，載重量龐大，結果終於成功了四個厚長的空中怪物，二十二噸的波音S十七號，即一般所稱之空中堡壘，與二十噸的B二十四號，二者均可載炸彈五噸，單程飛行一千五百哩，另據二月九日東京朝日新聞載稱：美國加省之道格拉斯飛機製造廠，曾於去年八月九日開受美國陸軍部之囑託，開始製造超巨型轟炸機，名道格拉斯十九號，又名半球擁護者，其外殼已告成功。該機翼幅長二百一十二英尺，機身長一百一十二英尺，全重量約八十噸，裝有二千匹馬力的引擎四具，最高速率每小時二百一十英里，合三百三十六公里。可裝載炸彈十八噸，及一百二十五人之武裝兵。不着陸飛行，一氣可達七千五百英里，約合一萬二千里。若以夏威夷為根據地，橫香山至東京間三千四百英里，該機可以轟炸後安全

過去，為加強此種轟炸機之效用計，機上並裝備美國軍事祕書之新柏利  
投彈標準器，其精確程度雖在三萬呎高空投彈，亦可命中標的物。

### 防空新法——輕氣球障礙網

海上對抗潛艇襲擊的方法是敷設水雷障礙區，而空中對抗敵機空襲  
的新法，則是佈置輕氣球障礙網。輕氣球的構造長六十六呎，高三十呎  
，乃是由六百根索纜組成，每個球中所盛的輕氣球約值五十磅，輕氣球  
障礙網乃防敵機俯衝投彈的最善方法，因為轟炸機俯衝投彈的速率為  
每小時四百哩，即每三十秒的速率三哩有餘，假如轟炸機俯衝投彈時在  
這三哩多的過程當中一旦碰着輕氣球的索纜，必然機毀人亡。氣球本身  
並不如索纜重要，氣球的作用僅在懸住索纜而已。輕氣球障礙網的弱點  
是氣候限制，人們如果看不見輕氣球升起或升起之後忽又降落，這並非  
表示沒有索纜的危險，而是氣候不宜，氣球障礙網的敗壞。

### 第十四期作者介紹

伍啓元先生是國立西南聯合大學經濟系教授。

王政先生曾任國立中央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多年，現任社會部簡任視  
察。

李長之先生對於哲學文學都有很深的造詣，現任國立中央大學文學院講  
師。

陳劍樞先生是一位小學教育專家寫過很多關於小學教育的著作和文章，  
現任國立中央大學師範學院教授。

歐之暹先生任國立清華大學教授有年，現任行政院參事他以前已為本刊  
寫過許多文章，仍願於公餘之暇，常為本刊撰稿，這不僅是編者  
所極感感謝的一番盛意，相信也是讀者所開樂的一個消息。

### 暴日的新發明——空祭

二月五日敵酋大角乘軍用機由廈門飛廣州，後由廣州飛海南島，策  
動兩進軍事，在中山縣屬之斗門被我軍機槍密集火網擊落，敵海軍高級  
將領死難者計有大角學生大將，須賀彥次郎少將，餘為隨員角田、藤中  
佐，白濱榮一中佐，立見忠五郎中佐，松田秀雄大尉，另有機長黑野實  
雄，操縱士野廣明，機師高岡真治，末見次郎等。次日敵機多批又  
輪迴出現於斗門上空，在低氣壓下，熾念地盤旋着。它忽散發傳單，忽  
而投擲花園和紙錢，最後還拋出一支「日軍旗」。請求部長把它繫在大  
角的墳上，原來那就是敵人所謂的「空祭」。傳單上面寫着這樣悲慘的語  
句：「告斗門鄉長太陽昇於本年二月五日御勅海軍大將大角學生着陸當  
戰死君知之我等空祭於野無他意祈將日章旗置於墳前必勿忘，如意爆碎  
斗門英骸」

淪陷區域內同胞的犧牲奮鬥，海外同胞的努力捐輸，以  
及前線將士的浴血殺敵，後方民衆的嚴密建設，更表現了我  
們全國一致同仇敵愾的民族精神。這種精神，不僅使敵傷屈  
蹙，而且證明我們中華民族是有偉大的基礎和無窮的力量，  
把我們民族的地位格外提高，得人類寫下「正義戰勝力量」  
最光榮的歷史。（總裁調詞特輯）